

“一国两制”的原意和香港实践的发展

许锡挥

(中山大学 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 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 本文论述了“一国两制”的本来意义, 并对它在香港六年实践中的发展及遇到的新问题进行分析。

关键词: 一国两制 香港 实践

“一国两制”在香港已实践了五年多, 这五年时间里, 各种矛盾和问题如此集中地显露出来, 并不是坏事, 它使这个理论构想原本需要很多年才经历的考验, 提前出现于实践的初期。“九七”之前, 我曾预言, “一国两制”的实践必定会将理论抛在后面, 到时这个理论要注入新的内容。目前, 要谈这个理论的发展, 似乎为时尚早, 但有不少值得思考的问题正急待我们去探求。

当前, 在有关香港出路问题的各种议论中, 涉及“一国两制”的意见不少, 其中包含着实践提出的新思考, 也显示出内地和香港许多人对这个理论缺乏真正的了解。本文试图就“一国两制”的原意和实践过程的新思考与大家共同探讨。五年以来, 我感受到许多香港人对于“一国”缺乏精神准备, 而许多内地人对于“两制”也缺乏必要认识。在此情况下, 就这个问题展开广泛的讨论, 是十分重要的。

“一国两制”的原意应包含三层内涵: 一、主权问题没有讨论余地; 二、实事求是地对待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社会制度; 三、容许一国主权范围内存在局部“异域”。关于第一点没有什么争议, 不必多讲; 而第二和第三点则大有文章可做, 这也是本文探索的重点。我期待它引起讨论, 也准备着听取批评。

一、原意的核心: 唯物史观的生产力论

这个被英国“铁娘子”称为“一个有创造力的想法”, 其理论构思决不象某些人所云那么简单: “迫出来”和“争得来”的。至于它首先为解决台湾问题还是港澳问题而设计, 这无关重要, 因为不影响其原意的核心。

我们要抓住“一国两制”构想的核心, 必须将它与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的中国和世界历史发展趋势联系起来, 与中国对自己发展道路的重新探索联系起来。曾有人将这个构想的萌芽倒推至 50 年代, 这显然将它与“暂时保持现状”及“暂缓社会改革”的策略措施混为一谈, 阉割了它的时代性。

邓小平将“一国两制”归功于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这不是空话。80 年代中国领导人重新找回生产力论, 依据唯物史观去观察人类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认为不能随意去废除一种仍然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社会制度, 也不能随意去建立一种超越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社会制度。香港现存社会制度既然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 就不能加以改变。而且, 在中国广阔大地上, 人们正在根据生产力标准调整自身的发展模式和制度, 因此, 不具备改变香港社会制度的客观基础。这就是“一国两制”构想产生的特定历史条件。

必须指出, “五十年不变”和“五十年之后还会不变”, 这是说, 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

社会制度不会被人地改变。任何离开这个根本点去理解“两制”，都是非科学的，也是违背原意的。

从长远来看，五十年至一百年之后，当内地和香港的生产力高度发展，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那时，这个或那个制度的外壳都容纳不了已长大了的生产力内核，自然的变革就会到来，再去讨论变与不变的问题，已失去实际意义。

将话题回到现实的香港，人们应当明白，在今后漫长的年月，既要保持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根本制度不变，又要不断调整和改革各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具体制度，才可能延长这个外壳的生命。这就是变与不变的辩证法。躺在“不变”的年历上睡大觉，是没有出路的。至于那些为着小群体自身利益而反对改革的声音，则是损害香港前途的。

二、保持香港社会特色：不仅是资本主义

“九七”前后，不少人以为香港保持资本主义制度不变，“马照跑，舞照跳，股照炒”就万事大吉。许多内地人士认为，有了这个制度性的不变承诺，已经足够了。其实，就世界范围来说，香港不是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它从中国封建社会脱胎而来，经历英国非典型的殖民统治，又受到中国和世界百多年剧变风暴的洗礼，在特殊的社会、历史、地理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下，构造出一个特殊的社会。

过去，英国本土人对他们同胞管治下的香港羡慕不已。“在许多方面，香港为英国宣扬其价值和能力的表现较英国本身为好。”(罗拔·郭瞳著，岳经纶等译：《香港的终结》，明报出版社 1993 年(香港)，第 68 页。)当英国走向衰落的时候，香港却展翅腾飞雄踞亚洲。香港的制度性特色，是由独特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环境所造成。这样的城市，这样的社会模式，不仅中国没有，世界上也难找。我们常常谈及“香港优势”，这“优势”，绝不仅仅是仍有生命力的资本主义，而且包含着许多其他资本主义社会所没有的因素。

今日，面对回归已五年多的香港，面对我国沿海大城市的飞速发展，人们议论香港将被赶上、被替代，这是很自然的。但是，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所谓“世界轮流转”是有条件的。环视中国沿海大都市，在可见的将来，都难以拥有香港的制度性特色优势。当然，如果香港失去这种优势，那就另作别论。香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一定要守住这个“特色”，才能不失去它的优势。

《基本法》不仅明确了香港的根本社会制度，而且在各章有关条款中也体现了保持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的特色的原则。当然，还有未及注意之处，待日后补充。我们内地人在处理涉港事务时，应当十分清醒和小心地尊重、保护这些“特色”，而不要随意去批评它，损害它。至于还不了解这些“特色”的人，就应当好好去读明白香港这部“难懂的书”，切勿信口开河。这也是遵守《基本法》所要求的。

总之，香港就是香港，我们不希望它成为上海，也不希望它成为新加坡、东京，它只能成为自己。而“两制”正是保护香港“特色”存在的城墙，这面墙不能拆，也不能摇。

三、保持国际化：中国主权下的“异域”

我之所以用“国际化”而不用“国际性”这个词，是有意将香港的定位与我国沿海其他正在成为国际性都会的地方区别开来。这个“化”并不含有特定的那种内容。

香港本来已经是一个国际化城市，有最开放的经济体系，有多元的文化，有全球流动性最大的人口结构。仅仅列举《基本法》所规定的几条对外事务细则，我国任何一个沿海城市都不可能“化”到这个水平。回归以来，这种国际化的地位，在“两制”的保障下，基本上没有改变。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出现了某些值得关注的倾向，这些倾向涉及我们中国究

竟需要一个怎样的香港这个原则问题。

有位外国学者曾这样描述百多年来香港的独特地位，他说：香港是一个中国城市，但它是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地方，与中国沿海城市截然不同；香港受英国人管治，但其英国味道并不浓厚。造成这个独特状况的原因是什么呢？源于它是由分别摆脱了本国控制的中国人和英国人共同创建的。这位学者的观点不见得准确，但他至少说明了一个历史事实，鞭长莫及的英国统治者没有象管治本土那样去控制香港。对于英国人来说，香港这个中国化的城市，实际上是挂着米字旗的“异域”。这样一个奇特的香港，曾经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有过重要的影响。今天，当香港已经成为中国特别行政区时，我们不能忽视历史留下的遗产——“异域”地位。

“异域”并不是可怕的东西，不同就是异，两种制度并存其实已经包含此意。回归后的香港应当保持其“异”的主要特征就是国际化。

当我们加强内地与香港经济一体化，建立更紧密的经贸关系时，香港的定位应当是——背靠大陆面向海洋，而不是背向世界面向内地。这关乎香港经济生存的基础，也关乎中国整体利益需要。

当我们加强内地与香港文化交流并促进融和时，应当清醒地认识到香港保持和发展多元文化结构的重要性。它有西方文化，而且不止一种西方文化；它有东方文化，而且不止一种东方文化；它有中国文化，而且不止一种中国文化。这种互相交汇以及交而不融，或者外化和化外的多元文化结构，正是香港社会活力的源泉，也是大中华文化繁荣所需要的。

有人常说，香港不是政治城市，对此我已发表过许多不同看法，不想再讨论。但是，香港在中国历史上所扮演的重要政治角色，已载入史册。而回归后的香港将继续发挥政治作用，应是符合客观规律的。五十年前周恩来曾指出，从战略全局着眼，香港是我们的了望台、气象台和桥头堡，这不是明白说清了它的政治地位了吗？今天，形势已发生巨大变化，香港已回归祖国，但我们仍然应当利用其特殊地位，发挥特殊政治作用，这也是其他城市代替不了的。为此，保持其“超脱性”和缓冲地位十分重要。随着国际风云的变幻，将会更加显现这一点。

“异域”地位当然具有矛盾性，积极面和消极面并存。香港回归前后，曾有人提出“清垃圾留珍珠”的主张，此意不全错。但香港这个特殊社会，正是珍珠与垃圾依存，甚至两者难分。例如，它既是信息中心就会成为谣言传播中心。我们的本事应在于为我所用，而不能因噎废食。五年以来，许多内地人对香港所出现的问题，往往缺乏这个辩证思考，这也可以说是对“两制”的认识不足。

四、两制互动：在竞争与比较中发展

香港回归五年多来，有些人在议论“两制”各自的长短时，视野往往过于狭窄。如果我们高瞻远瞩、放眼天下，就会发现柳暗花明处的宏丽山村。当前，世界正处于多极化和一体化的交错运动之中。在“一国两制”格局内，“一体”和“多极”有着特殊的相互作用的条件，从而造成本国社会发展的特殊优势。

这特殊优势当然首先是两种制度之间的联系和合作，因没有国界的限制而较为有利。但是，我强调的是两制之间的竞争性互动。实践证明，香港和内地在很多领域虽可以“衔接”和“整合”的，然而有不少领域是不能如此的，仍是“井水不犯河水”，你干你的我干我的，甚至会产生摩擦和碰撞。在相互进行制度性竞争的过程中自我完善，这是“一国两制”发展的新天地。

制度性竞争包含摩擦和适应，各自显示其优势和暴露其劣势，相互吸取对方的长处，并

促使对方更正其制度性缺陷，这也是一个理想的可持续发展的辩证过程。

如果我们将 20 世纪地球上两大阵营的制度性较量和中国之内两种制度共存联系起来作比较研究，就会发现很重要的历史现象。今日的世界格局使人产生了错觉，似乎是一种制度自身压倒另一种制度，而忽视了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存在曾经形成的压力，正是促成资本主义体系进行部分否定自身的结构性改革从而克服危机的重要因素。其实，资本主义的改革比社会主义的改革来得更早。同样，社会主义制度的挫折及其全面的改革，也是资本主义体系从对立面的挑战所促成。没有对立面的挑战，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是很难实行自我完善的。

香港特色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直接而有力促进，已是众人皆知的。今后，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继续于一国范围内向另一制香港吸取养分，不必跨国互动，这是何等有利的条件！

至于香港，过去很少有人会考虑从内地的制度中吸取养分，更不会考虑借鉴内地经验去找寻克服自身制度性缺陷的药方。今日，香港人面临社会转型和经济困境，许多人从盲目自大走向失落和悲观。可是，极少人会从香港社会的畸型和弊端中醒悟到要吸取另一制的积极因素，他们对自身的既成模式即使暴露出缺陷，仍然忘乎所以。

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当前香港社会浮现的种种新鲜事，已经向人们展示一个图像。一向崇尚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市民，如今伸出拳头抗议政府“监管不力”，许多本应“各安天命”的个人祸福，也寄望政府来做主。社会上关于“反对贫富悬殊”、“反对大财团垄断”、“反对商界政府”等呼声中，已显露出某些非资本主义性质的素求。尤为新鲜的是，某些激烈的反共团体和人士，为了争取草根阶层的支持，竟与被喻为“欧洲共产主义复活”的运动相呼应。不管当事人自觉不自觉，事实就是如此。看来，两制在竞争、比较中互动，已是自然之事。

香港在当前社会转型的进程中，吸取另一制的积极因素，可以在一个国家范围内自觉或半自觉地进行。当然，这种“自我更正制度性缺陷”的动作，是艰难以至痛苦的，但“一国两制”的优势为其提供了有利条件。

结 语

“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五年多来的经验、教训和暴露的问题，是完善和发展这个理论构想的宝贵财富。“九七”前夕，我曾在座谈会上提议，待将来实践成熟之时，应有一部权威性的巨著——《一国两制论》问世，这部巨著应是有关人士(包括香港各界)共同实践的成果。

The Meaning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and Its Practice in Hong Kong

XU Xi-hui

(Center for Studies of Hong Kong ,Macao and Pearl River Delta of Zhongshan University, Guangdong Province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the meaning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the changes and its practice in Hong Kong after 1997.

Key words: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Hong Kong Practice

收稿日期: 2003-03-12

作者简介: 许锡挥, 男, 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 教授